

侯绍庄 著

黔史 论丛

- 贵州高原历史的开端
- 红岩古迹诸说质疑
- 『鬼方』西南说证误
- 夜郎族群考
- 秦象郡所属黔地考
- 沅江通航考
- 广顺古堡考察记

贵州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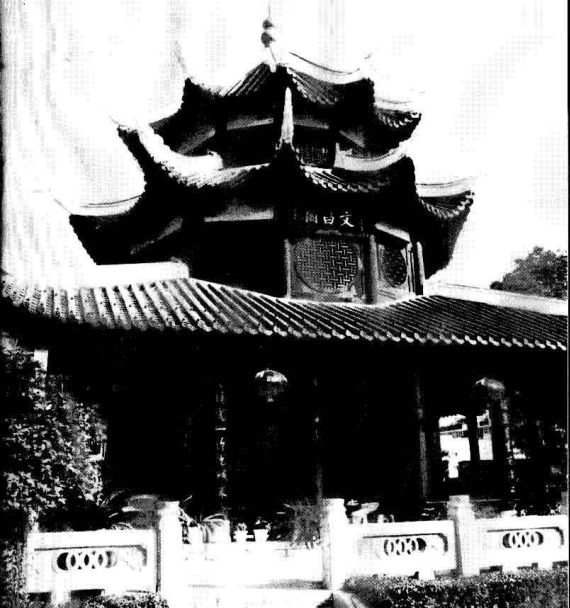


侯绍庄 著

黔史

论丛

贵州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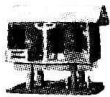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黔史论丛/侯绍庄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8
ISBN 7-5412-1285-7

I. 黔... II. 侯... III. 贵州省—地方史—研究
IV. 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269 号

书 名	黔史论丛
作 者	侯绍庄 著
责任编辑	杨成星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责任校对	曹永兰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0 × 1 230 mm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序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首列殷“高宗 34 祀伐鬼方，次于荆。”再列一条伐了鬼方，“氐羌来贡”，然后加按语，附几页字的各种论述条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故独蒙鬼方之号，后就称鬼国也。”其实这两条一“次于荆”的荆字被误解为今湖北的荆，二未理解“氐、羌来贡”已明确“南蛮”不是鬼方。由于前辈人的地理知识有局限，没有怀疑和推断殷商时期的地理疆域，当时的人口和兵力，哪能扩展到长江流域今之乌蒙、娄山地方，所以甘于戴上这顶帽若干年。

中国自 1950 年以来，不断有学者以科学的观点，从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互参照研究，侯绍庄教授通过撰文和口讲，否定鬼方是贵州之说。

2003 年，《贵州通史》出版，第一卷《远古至元代的贵州》，撰稿人有谭用中、侯绍庄、张祥光、史继忠。主编者是侯、史两人。这一卷目录中已不见鬼方二字。这是贵州历史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同时期中华书局出版钱穆的《国史大纲》；还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著述，都把鬼方划到遥远的北方去了。《贵州通史》根据贵州考古的资料，写出早在距今 24 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的辉煌篇章。

我在 20 多年前就认识绍庄，他学有根底，有师承，立论有依据，文有章法，不苟同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有说他狂傲者，我以为“狂者进取”傲视荒谬，是做一个正直史学家的美德。王国维引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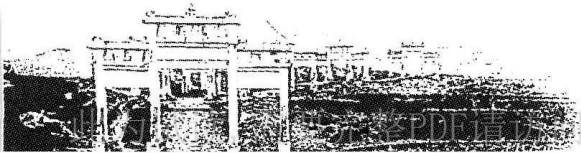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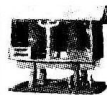
人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是做大事业的人必有的第一境界。一个知识分子选择了治史这条学问的道路，必然要博览群书，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才能通古今之变。学术界多有几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人，自然就会出现虎虎有生氣的局面。

绍庄解放后在军旅中生活过，到大学教书后，曾蒙上“白专道路”之名度过20年。但是，他真心走的是“红专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写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还出版《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研究》。与史继忠、翁家烈合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又与他人合作《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以及布依族、水族、仡佬族三部简史。现在收集有关贵州古史问题的34篇，辑为《黔史论丛》付印。

贵州有几个古史问题，如关岭红岩碑、夜郎和大夜郎、牂牁郡等等，至今还在众说纷纭中。红岩碑在关岭县，近些年来，本已被石灰封填、洗刷过，是一个难识真面目的石岩，有人愿出巨资求专家来破译。当时愿出巨资者没有考虑到，谁又能称是“太上专家”评空破译，谁是谁非？于是多种多样的猜谜和臆断之说，从四面八方寄来，有说大禹治水留下的古迹，有说明建文皇帝留下的反燕王棣的诏书，更有甚者，说是天外来客写的。本是一堆笑料，绍庄振臂而呼，写出14 000字的《红岩古迹诸说质疑》，洋洋洒洒，痛快淋漓，他一气呵成，我一气读完。劝大家不要为这个古迹过分操心。读此文后，亦可另寻蹊径去做考证吧。

夜郎问题，已有学者写过多篇考证文章，正在研究和求证过程中，但是突然爆炸出多个“夜郎点”，互相炒作，省内炒到省外，都盼望炒出一个热络络的旅游景点。香港《大公报》发表一篇《争当夜郎》的文章，对湖南和贵州炒作夜郎的县，颇有微词。小夜郎之后，大夜郎国亦登台了。绍庄于2003年出版一本《夜郎研究述评》，今又出《大夜郎国辨析》，希望夜郎研究专家平心静气的看一看这本书和这篇文章，纵有多种疑义，可以互相探讨。学术这门学





问不是市场炒作可以得出科学的或接近于科学结论的。

牂牁问题,最远见于《管子》一书中有牂牁二字。《管子》一书经过长期历史考证,非管子之作,是汉代人伪托他的名字写的,绍庄认为《管子》文非五霸时之文,地非当时人应有的地域概念,故引述《管子》不足为据。作者认为西南夷之前,史家如何理解得西南这一隅的地理。古人凭双足难以走遍平原大川、高山深谷,也有只看文稿,闭门造车而自圆其说的,如《两都赋》、《三都赋》;如《后汉书》中写尹珍“生于荒裔,不知礼仪”等等。历代战乱,本已些微的文献资料,哪经得起焚烧和抄没,建议考史者未经烹炼成熟或稍熟的东西,不要轻率上市,徒惹层层波浪翻卷之后,化作白水流向海洋而去。

绍庄治学态度严谨,考察研究从实处着手。他攻读历史时,云南大学李埏教授讲怎样研究历史的三句话、九个字,“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九个字的说明是:

是什么,是指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包括考订工作,这是历史研究的最初层次;

为什么,是要弄清楚这个历史事件为何发生在这个时代,表现为这个样子;

做什么,要研究这个历史事件在当时起了些什么作用,有什么效益,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

这个说法是历史学家应具有的逻辑思维和研究方法。绍庄运用这样的方法,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探究出一个又一个的老课题而得到新成果。他的笔下有遒劲之气,朴实之质,不见浮词滑语,没有美丽面纱,直抒襟怀,留存信史。最近些年,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很快,才一二十年有的就已追上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无法与自然科学并驾而行。人文科学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终究会影响一代人的精神健康。贵州半个世纪以来,毕竟出现了一群有素养的史学专家,他们的成绩,超过了民国时期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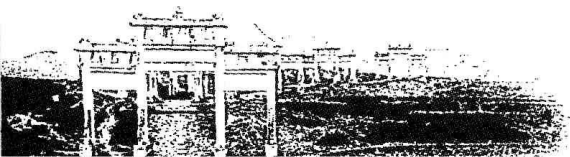




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可观。只是由于从浩繁的典籍中,从眼花缭乱的亿万千册包装漂亮的新书中,找一个攻关点,则是走进史学之门的人望而却步。而读史、考史、写史,继承、研究、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绍庄接二连三为贵州历史上纠缠不清的问题写出质疑和考订,有利于研究,有益于健康。感谢他给我们这份知识礼物,致以衷心的敬意。

陈福桐

200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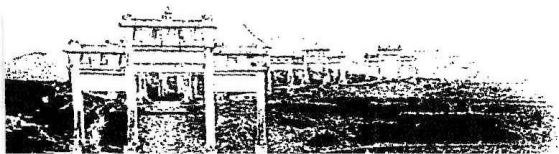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1)
贵州高原历史的开端	(1)
贵州高原原始文化的发展	(13)
贵州高原原始文化的繁荣	(25)
贵州高原原始文化的高峰	(41)
红岩古迹诸说质疑	(58)
“鬼方”西南说证误	(80)
“牂牁”考辨	(94)
夜郎族群考	(101)
夜郎诸说述评	(111)
“大夜郎国”辨析	(125)
庄跻入滇线路考	(130)
秦象郡所属黔地考	(138)
从犍为郡到牂牁郡	(147)
从“武阳传舍”铁炉看古代黔蜀交通	(153)
九真徼外夜郎蛮夷考	(164)
“僚”为濮越泛称说	(171)
《夜郎君法规》时代辨析	(184)
《夜郎族谱》订误	(197)
阿榨反元与安榨遗址	(209)





沅江通航考	(217)
也谈古代西南黄金通道	(232)
清镇汉墓出土漆耳杯考释补遗	(243)
习水蜀汉岩墓题记图像考释	(252)
两宋时期播州军民抗击蒙军的斗争	(258)
《明思州宣慰司副使刘贵墓志铭考释》订误	(268)
贵州十二生肖场镇名称探源	(285)
奢香生年考	(297)
维新大员——李端棻	(304)
论黎庶昌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319)
贵州民族文化概述	(330)
布依族丧葬祭祀歌词社会历史价值刍议	(357)
论台江苗族的神话传说	(376)
评所谓“日本民族与我国彝族同宗”	(386)
广顺古堡考察记	(401)
 后 记	 (408)





贵州高原历史的开端

贵州高原历来被人们视为蛮荒之地,谁知它却是我国远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由于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喀斯特发育十分良好,错落有致的平坝、山谷、盆地、丘陵、溶洞,不但为原始人类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空间,而且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慷慨赐予他们取之不尽的生活资料。因此,早在二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近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贵州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省境黔西县沙井乡的观音洞和桐梓县九坝乡柴山岗的岩灰洞,先后发现了属于晚期“直立人”活动的遗址。经多次发掘,除黔西观音洞尚未找到人类遗骸外,二处遗址共获得了大批人类遗骸、石器、木炭、烧骨以及动物骨骼化石等遗存。其中观音洞的绝对年代,从出土遗物的地层年代和伴生动物绝灭种情况看,比岩灰洞稍早,但均属于晚期“直立人”活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这就为研究贵州高原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它揭开了目前已知的贵州高原人类历史的篇章。

“桐梓人”的化石标本,是1972年在桐梓县北九坝乡柴山岗南坡岩灰洞发掘出土的,计7枚牙齿化石,包括门齿2枚、臼齿2枚、前臼齿2枚、犬齿1枚,分别属于老年、青年、少年、幼年四种个体。其性状特征与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相同个体牙齿化石比较:其右上内侧门齿齿冠切缘已磨耗成平面,齿质暴露,舌面底部中央可见底结节。其两侧各有一釉质褶,分布于齿冠两侧缘,使该门齿呈





铲形。齿冠的远中近中径为 9.2 毫米,唇舌径为 8.6 毫米,若非磨耗,估计齿冠高 10.3 毫米,齿根高 17.9 毫米,与“北京猿人”的右上内侧门齿数值十分相近。右上第一前臼齿,保存有舌侧齿根和齿舌面及近中面、远中面的一部分,齿冠咬合面未磨耗,主要形态特征仍然保存。齿冠的颊舌径和近中、远中径都较大,颊尖高于并大于舌尖,有明显的缘嵴和横嵴。舌面呈球状隆起,显得陡峻而无凹陷。这颗牙齿的许多特征,“几乎与‘北京猿人’的十分一致”。左上犬齿,齿冠切缘尚未磨耗,齿根还未生长,颊舌径大于近中、远中径,近中、远中面有浅纵沟,基部齿带明显,唇面横向上可见肋状条带,两侧缘有三角隆凸,舌面底突游离缘有粗嵴。这些性状与“北京猿人”童齿形态极为相似。由此可知,桐梓人的牙齿,宏观与“北京猿人”基本相同,微观有些进步性质的变化。反映在体质发展方面,其原始性比“北京猿人”减少了。因此其体质形态虽属“晚期直立人”,但绝对年代较“北京猿人”稍晚。

关于桐梓人的活动年代,原思训等以出土兽骨化石测定的第三、四层三个铀系年龄数据,显然偏低;沈冠军以岩灰洞表层钙板样品测定的铀系年龄数据为 20.6 万年,可以视为遗址的年代上限,以第三、四层堆积物下的流石和石笋样品测定的铀系年龄数据为 24.0 万年,可以视为遗址的下限。而动物化石、人类牙齿和打制石器,都出于第三、四层的堆积中。因此,它们的地质年代属于中更新世晚期,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体质形态属晚期直立人,其活动年代在距今 24~20.6 万年之间。

“桐梓人”遗骸,至今虽仅发现几枚牙齿,但从上述其基本特征与“北京猿人”十分相似的情况不难推知,他们已实现了手足分工,使上肢从爬行中分化出来,而且在长期从事劳动的过程中变得日益灵活,适宜于从事复杂的劳动,为制作工具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手足分工,“桐梓人”已完全进行直立行走,不过由于下肢还比较原始的缘故,还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做到挺胸直立,而存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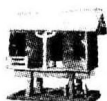


定程度的佝偻。另外,“桐梓人”的头脑,虽还带有较多的原始性,但由于直立行走的结果,所受外界事物映像的机会和范围大大增加,从而促使脑量增加,其智力发展程度与类人猿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由于直立行走,使发声器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由于他们长期从事集体活动的结果,彼此间已达到了需要进行意识交流的程度,于是语言也随之产生了。不过,这时的语言还十分简单,除仍大量沿用类人猿时期的手势语和呼叫语外,仅有一些诸如代表“火”、“树”之类,人们经常接触的事物的单音词,至多有一些譬如“野猪”、“烤火”之类的词组,还不能应用这些单词或词组,组成句子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

总之,“桐梓人”和“观音洞文化”的主人,已具备了早期原始人类的特征,其体质形态处于晚期“直立人”或“猿人”阶段。他们是迄今贵州高原发现的最早的远古人类,正是他们揭开了贵州高原远古文化最早的篇章。

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气候一般说比现代更加温和湿润,“观音洞文化”主人和“桐梓人”生活在此,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这可从两地遗址发现的 20 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得到证明。譬如灵长类的金丝猴、长臂猿、猕猴和猩猩,啮齿类的飞鼠、竹鼠、硕豪猪、豪猪和短尾鼬,肉食类的狐、古爪哇豺、大熊猫、鼬、獾、柯氏熊、最后鬣狗、虎和豹,长鼻类的东方剑齿象、贵州剑齿象、嵌齿象,奇蹄类的巨貘、中国犀和马,偶蹄类的野猪、鹿(包括 A、B 两个种)、鬣羚、麂、苏门羚和牛类。从这些动物的繁殖条件和食物习性看,当时以观音洞和岩灰洞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内,既有茂密的森林,以供肉食类动物和偶蹄类动物的栖息与繁殖;也有使啮齿类动物赖以生存的成片竹林;在山谷、盆地或喀斯特洼地的沼泽和湖泊中,还有犀等喜水动物出没其间。可能没有广阔的草原,所以野马之类的化石标本稀少。由于猩猩和长臂猿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的存在,说明在此区域内,小气候比较热。这样的自然





环境,是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场所,“观音洞文化”主人与“桐梓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依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着艰苦的生活。

当时的人类住在天然的山洞中。观音洞处于一个山间洼地边缘,洞口向西,高程约1 450米。洞穴为石灰岩裂隙,高出洼地20米。桐梓石灰洞,是发育于二迭系厚层灰岩的喀斯特溶洞,前临九坝河,高出河面32米,洞口西南向,高3米,宽2米左右,成之字形向东北延伸。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但可以躲避风雨浸蚀和防避猛兽侵袭,同时也便于获取食物。活动在河谷、洼地周围群山上的各类动物,不时要到山下的河湖沼泽饮水,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类依靠集体力量,猎取前来饮水的野兽,成为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同时他们还不时从周围山上,捕捉陆龟、蜗牛和挖取植物块根,采摘树上果实、嫩芽,以补充食物来源。当时人们要选择到这样合适的穴居野处之地并不容易,是在强烈的求生之欲驱使下,成群结队,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对许多可以栖身的洞穴及其周围环境,进行过多次“考察”比较后,才决定留住下来。

狩猎是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活动。在石灰洞遗址里,发现用火遗迹和被火烧过的兽骨,主要的有鹿、麂等几种,说明他们的常用食品中,有用火烧熟的鹿、麂、竹鼠、鬣羚、野猪等肉类。这些动物都生长在附近的山林中,除极少数可能因老死、冻死伤亡而成为人们的食品外,绝大多数则是人们狩猎所得。又如观音洞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单个牙齿和一些残破的肢骨,没有完整的骨架和头骨,下颌骨能够保存完整齿列的标本也很少。这就说明,这些野兽当年既非坠落或陷进该洞致死,亦非其他肉食类动物伤害所致,特别是一些大型素食动物如犀、貘、象、牛之类,多半死于青年或成年阶段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些动物遗骸,主要是当时人类在世代狩猎活动中捕捉或击毙后,带回住地食用后的残存。

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桐梓石灰洞发现的石器仅





12件,且其形制与类型均属常见,难作深入分析。而举世闻名的黔西观音洞,经1964~1973年4次发掘,共获石制器物近4000件之多,为贵州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名列全国前茅奏响第一乐章。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等多次指出,黔西观音洞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

观音洞出土的石制品,分别用燧石、硅质岩、细砂岩及火成岩制作,可分石核、石片、石器三大类。

观音洞出土的石核除少量标本为碎块剩块外,绝大部分是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石核。从台面观察,人工台面占多数,天然台面次之。台面角最大 90° ,最小 50° 左右,一般 $70^{\circ}\sim 85^{\circ}$ 。石核大小不一,大者长度可超过100毫米,小的长度仅20~30毫米。

观音洞遗址出土的石片,从加工技术看,主要是用锤击法打制而成,用碰砧法者很少。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石片所占比例很小,形制包括天然台面、素台面、小台面、有疤台面、有瘠台面和人工台面六种石片,以人工台面者居多。也有一定数量的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石片。大多数石片上的半锥体不显著,打击点附近有些是凹陷的。

观音洞出土的石器大多数用石片,少数用石核和石块加工而成,占石制品总数的66%,是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址中石器成品率最高者。可分刮削器、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凹缺刮器和雕刻器六种类型。

刮削器,数量多,器形复杂,体积较小,约占石器总数的82%,一般长30~80毫米,最小者不到20毫米,有多刃、单刃之分。因其加工时是用石锤直接打击毛坯的边缘,刃口粗钝,刃角多在 80° 以上。

端刮器的加工部位主要在石器一端,故称端刮器。观音洞出土100余件,形制有单端、双端和尖端三种。

砍砸器有80余件,器身大而长,且多长大于宽。大件长度超





过 100 毫米,小件长约 70 毫米。多数加工粗糙,刃缘曲折参差,少数加工精细,刃缘匀称。有单刃、双刃、多刃、端刃、尖刃之分。其中极个别者刃部呈杏仁状,有的学者认为“亦可称为原手斧”。

尖状器有 70 余件,属小型工具类,长度多不超过 20 毫米。修理时常用垂直打击和复向加工,故侧刃很钝,尖刃锋利。按其形状可分为厚刃、薄刃和三棱尖头三种。

观音洞出土的凹缺刮器为数甚少,其与凹刃刮削器的区别在于,凹入较深,加工着重于凹入部分,且凹入分布仅限于较小范围。

雕刻器件数较少,体积小,刃部尖似凿口。

这些,既是观音洞和岩灰洞的远古人类用以猎取野兽的工具,又是剥取兽皮、切割兽肉、砍砸兽骨的生活用具,同时还是他们抵御猛兽侵袭的防身武器。他们就是使用如此简陋的工具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可见当时的远古人类生活极其艰苦,而且有随时丧身的可能。

1972 年发掘岩灰洞的堆积物时,常见零散的木质炭屑,并获得几块经火烧过的动物碎骨化石,但未发现灰烬层。烧骨的含炭量为 14.96%,表面呈黑色、灰白色和浅黄色。管状碎骨的内壁光滑,外壁较平。其保留关节者,骨松质构造已烧成焦黑。为探索烧骨性质而做的一些试验表明,烧骨表面的不同色泽,系燃烧时间长短和火力强弱所形成。据考察,当时炭灰洞附近无森林大火痕迹,说明这些烧骨乃是穴居于此洞中的原始人用火的遗迹。这是目前我国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用火最早的证据。用火在人类生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首先,它大大提高了人类同自然斗争的能力,可以用火御寒和改善潮湿的居住条件;可以用火防御猛兽,减少被袭击和伤害;其次,开拓了人类的生活领域,增加了食物种类,特别是由于用火烧烤食物,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因熟食有利于肠胃消化,更好地摄取食物营养,促进了猿人体质尤其是大脑的发展。韩非子说,我国上古时期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





火”，结束了“人民食果蓏蜚蛭腥臊恶臭”（《韩非子·五蠹》，《诸子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的野蛮生活，成为历史上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和圣人，这一传说反映的正是人类历史上这一阶段的情况。

当时的人类生活在崇山峻岭间，周围森林密布，杂草丛生，毒蛇猛兽出没无常。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单个人的力量极其微弱，分散则不足以自卫，更不能猎取较大的野兽，只有用群体的协作力量和集体行动以弥补个人力量之不足。所以，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与其他成员一起共同协作，共同劳动。只有在群体中，共同制造和使用工具，共同保存和使用火，共同防御猛兽和猎取食物，才能保证个人生存。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狩猎并非每次都可奏效，而采集又要受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食物往往不能满足全体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更何况当时他们不但缺乏保存食物的意识，也还没有这种条件。因此，对仅有食物，只能实行平均分配，以维持全体成员的生存。即使偶而有了剩余，也是“饥则求食，饱则遗弃”。总之，起码的生存条件要求他们结合起来，过着群居生活。

从他们居住的处所看，黔西观音洞，主洞全长90米，宽2~4米，高2~8米。入洞35~46米处，又岐分为南北两个支洞。桐梓岩灰洞也仅宽2米，高约3米，自西南成“之”字形向东北延伸。这样的活动面积，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是不可能容纳很多人在一起生活的。故他们大约是几十人结合成一个群体——原始人群。这种群体是他们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贵州高原出现的最早的人类社会。

贵州高原的远古人类虽以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生活舞台，然而生活并不轻松舒坦。因为，人类体质、生产工具、劳动经验，都还处在原始状态下，即使一年到头不知疲倦地为猎取野兽和采集植物果实块根而劳动，也难以获得几十个不同年龄档次人们生存所需





的食物。从岩灰洞出土牙齿化石看,桐梓人寿命并不长,故未成年者死亡率很高。在7枚牙齿化石中,只有2枚门齿属于老年个体死者,其余5枚分别属于青年、少年和幼儿个体死者,占总数的71.4%。这样高的未成年死亡比例,实在令人怵目惊心,导致其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是食物匮乏。同时,在这7枚人牙化石中,有4枚的齿冠釉质内,都有一道黄色横向小凹坑,乃是氟性斑釉齿病遗迹。这种病虽不致影响患者生命,但对其健康状况仍有一定影响。何况还有许多其他疾病和社会因素,是我们无法确知的。

关于原始人群艰苦生活情况,贵州民间故事和古歌有生动具体的描述。如威宁苗族《古史传说》追溯其远古祖先,曾生活在“野箐黑漆漆,老林深惨惨,獐子鹿子到处跑,豹子老虎满山窜,毒蛇恶虫到处爬”的环境里,为了求生,他们只有“一帮一帮地聚居,一群一群地生活”;他们没有衣穿,“用树叶编起来披在身上”,可是太不结实,“一天要磨坏好几件”;也不会盖房子,“只好住在洞穴中”,有的架木为巢,“栖身在大树上”。水族民歌《开天辟地造人烟》说:远古祖先“没有衣服,拴块兽皮,串木叶,也当衣裳”。布依族《古歌》说:古时祖先“不兴四季,不兴记年,不兴时辰,不兴日数月份”,他们“黑在坡脚住坡脚,黑在岩洞住岩洞”,“拿芭蕉叶遮雨,下雨就湿透,出太阳就干”。至于远古祖先住山洞的传说,其他民族故事里也有许多传说,且无不讲得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

在原始群阶段,人们之间的两性关系,一般说是原始的乱婚,还不可能有社会成员间两性结合的任何规定,在习俗上也不可能对两性关系加以任何限制。正如《列子·汤问》所说:“太古之世,其民聚生群处”,“无亲戚兄妹夫妻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娉”(《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不过“观音洞文化”主人和“桐梓人”均处在晚期“直立人”的后期阶段,其时代距离人类形成已达一二百万年以上,因而在两性关系上应已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时,不分长幼班辈的原始乱婚

